

改良主义而非修正主义： 中国全球角色的浮现*

朱云汉**

【内容提要】 中国实力的上升并在全球事务上表现出的更大雄心，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第一”口号下对于战后由之缔造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引发了世界范围有关自由国际秩序前景的深切忧虑。“中华治世”会否取代逐渐衰退的美利坚盛世下和平？借用奥兰·扬有关国际领导权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中国已经在过去几年的全球治理中成功展现了其行使结构型、创业型和智识型领导权的能力、意愿和技巧。从长远来看，国际领导权更迭的未来已经从这里开始起步。尽管中国全球战略的轮廓仍在逐渐地展开并完善着，但追求与既有霸权的“建设性交往”、捍卫并改革多边主义架构、深化南南合作以及保卫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是其中最关键的四个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试图建立一套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对的全面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西方世界的这一错觉来自他们西方中心的两类思维，也即将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上的三类自由主义元素混为一谈，并固执的将现存的等级秩序与自由主义的规范和原则混为一谈。中国只准备在现有秩序的架构内，在其资源、能力和责任明显合宜的领域，扮

* 本文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莫盛凯翻译，并经原作者校定。英文原稿出处为：Yun-han Chu, “Will Pax Sinica Succeed a Receding Pax Americana,” Paper for delivery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m the Western-Centric to a Post-Western World: In Search of an Emerging Global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co-organized by Taiwan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Fair Winds Foundation, Taipei, June 2–3, 2018.

** 朱云汉，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

演建设性的改良者角色。后霸权下世界秩序的复杂多样既非美国盛世下的和平也非“中华治世”所能覆盖。

【关键词】 世界秩序 国际领导权 修正主义 中国全球战略

一 导论：“中华治世”会取代逐渐衰退的美利坚盛世下和平吗？

随着中国开始追求更具雄心的全球议程，西方政治领袖中对中国快速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特别是支撑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价值和规范潜在威胁的担忧正在日益加剧。

德国前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即将离任的前夕，于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开火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指控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企图建立一个全面的体系，从而以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重塑世界”。他警告称，“这已经不再只是经济问题：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可以替代西方模式的全面体系，这一与我们所不同的模式，并非立足于自由、民主和个体人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他最近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也以一种更加含蓄的方式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包括联合国和北约在内的那些制度的弱化留下的真空地带会使那些并不与美欧享有相同价值观的崛起大国乘虚而入。”他并没有以点名的方式提及，但很明显他意指中国。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迈出了更大一步。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23次提及中国，且集中于指认中国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威胁，并誓言美国将会进行反击。这一文件还正式指认中国是正在挑战美国利益的两个“修正主义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俄罗斯）——它们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该文件还确认“美国的责任不仅是要与中国的战略做抗争，还要阻止中国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小国以及干涉他们的政治体系”^①。

西方政治精英对于中国正在展露的全球影响的担忧是合理的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于中国在全球性议程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深刻挑战一种出于偏颇而狭隘角度的理解，而无视其复杂而多面向的内涵？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来支持所谓中国的全球战略乃企图以一个全面、可替代的体系取代美国领导下的体系的这种流行论断?本文尝试破解并解决这一在西方社会中极易激发一场情绪主导政策辩论的棘手问题。下文将分四步推进。首先,通过应用最早由奥兰·扬(Oran Young)引介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本文解释了为何中国有潜力成为可靠的全球领导者并有能力成功地局部取代美国的领导角色,特别是如果美国越来越转向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其次,本文为中国正在酝酿的全球议程的基本轮廓提供了分析,探索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更为宽泛的意涵。再次,本文正面回应了西方社会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是否是一个矢志于推翻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最后,在结论中,本文认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将会是复杂和多形态的,无论是美国盛世下的和平还是“中华治世”都将难以撑起。如果西方政治精英真诚地希望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遗产,对他们而言,明智的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承认在守成国和崛起国间进行利益和责任的再平衡,在维护和改革现有多边国际制度以及落实多边合作倡议以解决威胁到全球共同体的社会可持续性的新挑战的问题上,与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建设性地交往才是当务之急。

在本文中,“美国盛世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一词被用来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更经常地,两者被交替地使用着。美国盛世下的和平经常被定义为一种“自由霸权秩序”。它是一种霸权,是指美国过去在从军事、经济、货币与金融、科技、文化到意识形态的国际体系的每一个重要领域都享有绝对优势。根据它规范性的建构(虽然真实的结构更为混沌而且内部矛盾重生),它之所以是自由的在于美国寻求将国际体系转变为一个基于规则、由开放的多边制度进行管理的秩序。霸权方受到制约不会为了攫取短期单边利益而去滥用其权力不对称关系下的优势。美国利用其优势力量使其他大国协调彼此多元,有时甚至是冲突性的利益,以及联结起来维护相互间的共同利益,以实现诸如永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等更大目标。同样在规范性建构的层次上,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联合国安理会或是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的高度节制,战争和侵略不再被认为是解决国家间冲突或是增进国家利益的合法手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被严格管控。

此外,依据持“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家们的说法,霸权在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公共产品不仅包括和平、安全和开放的贸易体系,还包括跨越国界的产权保护、航行自由、国际商业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以及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霸权还扮演着危机时的稳定

者角色，在金融危机中以贴现和别的方式提供流动性扮演最后借款方，在国际性衰退时扮演最后购买方，也即提供反周期财政刺激和为滞销的商品维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① 像“霸权稳定论”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这样的学者就相信，这些公共物品的稳定供给需要一个霸权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和负担。只有霸权拥有政治和经济实力来强迫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遵守规则并分担成本。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质疑维系一个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必须要有霸权，但他们可能都同意在其他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出现之前，霸权可能是缔造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②

即便是自由国际秩序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具有自由特征的等级秩序。^③ 透过建立规范和制度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施加战略约束，以及基于实力的等级制合法化的系统性努力，霸权体系以制度化形式出现。但许多特权被保留给了构成秩序核心的霸权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平等相待，许多情况下规则以对主导行为体最有利的方式被创造和应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霸权秩序总是脆弱的，因为随时可能遭受其创立者的片面行动与短期机会主义行径的践踏，霸权国的任意违规行为可能扰乱甚至动摇体制的合法性。

如今，许多观察家都相信我们正在逐步接近美国盛世下和平的终结。美国不再在全球政治经济诸多领域享有绝对优势，支撑美国主导的具有自由特征的世界秩序的国内基础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主要由新兴国家崛起以及伴随的地区利益带来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重心的转移，已经导致了世界秩序逐步脱离了美国的单一主导地位。^④ 在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式微势必加速。特朗普政府不仅放弃了国际领导者的地位，其不明智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正在损害许多美国帮助建立的多边制度。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哀叹的：“大国缔造的秩序来而复往，但它们往往终结于谋

①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19 - 1939*,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Charles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 - 13.

②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 - 614.

③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杀而非自杀。”^①然而，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否成功取代美利坚盛世下的和平？西方的政治精英们应当为这一前景而警醒吗？

二 领导权更迭：未来已经到来？

仅仅在几年之前，有关“中华治世下的和平”或是中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讨论，最初仍然只是少数富有好奇心、前瞻性的学者和一些大趋势分析家的纯学理探讨^②，而非框定西方政治领导人和栖身于智库的政策分析家们展开政策辩论的工作假定。^③

好景不在。西方的许多政策制定者（他们或许并不乐见这一前景），突然感到被迫要严肃的面对正在浮现的现实。他们要么动员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来直面这一威胁性的转变，要么弄明白如何重新定位其国家的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以与即将到来的领导权更替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相搏击。

历史学家可能会指出几个清晰标识了从美利坚治下和平向“中华治世”过渡的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伴随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接力棒从G7向G20的交接，以及最令人震惊的，2015年奥巴马政府劝说其最紧密的西方盟友不要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目睹亚投行在美国的极力阻扰下仍成功设立，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摩斯（Larry Summers）评论道：“过去一个月可能会被作为美国失去其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角色的时刻而被铭记。”^④毫无疑问，这一转换进程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特别是他要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伊核协议的决定而加速。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石正在被政治上的内爆所撕裂——随着特朗普带领美国从国际领导地位上退却并转而攻击现存的多边协

①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3, 2017, pp. 2-9.

② 例如，Peter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③ 一个明显的例外来自 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④ Larry Summers, “Time US Leadership Woke up to New Era”, April 5, 2015, <http://larrysummers.com/2015/04/05/time-us-leadership-woke-up-to-new-economic-era/>.

定，西欧的许多主流政治势力被左翼的激进反全球化运动和右翼的反欧盟民粹主义运动所冲刷——中国反而成了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灯塔，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一体化继续前行的主要动力源泉。当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获邀在全球商界精英齐聚的年度冬季度假胜地达沃斯向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他们才不情愿地意识到如果世界要寻找美国的继任者来维系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在日益上升的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面前保护多边协定，承担使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向着取得长期目标成果的方向聚合起来的主要责任，从而避免全球政策议程偏离全球相互依存现实，以及重塑经济开放的合法性并处理其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后果的迫切需求，中国是眼下唯一有望的备选国家。

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具备成为可靠替代者所必要的能力和水平，如果我们使用奥兰·扬的框架来衡量国际领导权的有效性，答案可能会使绝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① 在扬最初的构想中，他区分了三种领导权，可以回应解决或是避免损害共同获益潜力的集体行动难题所需，也即结构型领导（structural leadership）、创业型领导（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和智识型领导（intellectual leadership）。结构型领导是指将占优势的物质力量，比如强制力、生产力和金融力量，转化为产生新的合作方式或是催生新的多边协定或制度的国际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筹码之能力。创业型领导涉及议程设定，新的政策选项的创设，以及在国际合作中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成就而补偿其中的利益相关方的权宜措施；智识型领导则依赖知识和观念的力量来塑造支撑制度性安排的原则背后的思想、指导对有关问题的理解、使政策方向指向更好的替代选择。扬认为，这三种形式的领导权在20世纪下半叶从环境议题到防止核扩散的多种国际制度建立的谈判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仍不是广为认可的国际领导者，迄今为止，欧盟的领袖们只是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视为对抗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一种风险对冲。因此中国并未被赋予足够的机会来证明她足以遂行这三种形式的领导权。平心而论，今日之中国已经具备发挥有效之国际领导所需的绝大部分要素。此外，在较短的时间以及多个领域内，中国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BRICS）、中非合作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在2017年9月发起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中国与六个主要

^① Oran Young,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1991, pp. 281–308.

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新的多边协商平台的建立等多个有说服力的案例中证明了自身的潜力。

施展结构型领导权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定义、创造并巩固权力不对称性的必要结构型权力。在多种衡量标准上,中国已经在这一点上超越或是取得与美国的平等地位。根据IMF测算,以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便就名义GDP而言,这一超越也将在2025—2030年间发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早在2015年,中国就已经是92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或是最大进口来源地,同期美国仅仅是57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或是进口来源地。即便在AIIB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成立以前,中国提供的开发融资就已经超越了西方捐助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借贷机构提供的资金之和,也是2001—2015年非洲和拉美软贷款的最大来源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南南发展伙伴之一,截止到2015年年底,直接或是通过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国向166个国家提供了价值63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①根据日本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y)2018年的估算,中国的零售额将接近5.8万亿美元。这将使中国成为与美国相当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从而同样具备扮演世界市场上最后的商品购买方角色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造能力、工程技术和金融资源,以满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从发电、智能电网、深水港、铁路、高速公路、大众捷运、高速铁路到数字通信的一站式(turn-key)基础设施日渐增长的需求。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曾经获得过如此的基础设施援建能力,更不用说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意愿。

持怀疑论者可能急于指出美国依然享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科技上的领先,同时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依然根深蒂固。此外,尽管经历了最近二十年快速的军备发展,中国的武力投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人民币距离成为国际化的储备货币也依然很遥远,更不用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尽管人民币当前已经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事实上,当美欧在产出上增长缓慢的同时,中国正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科

^① Nicholas Rosellini,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Chinese Dream," *UNDP China Office*, April 19, 2017, <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ourperspective/ourperspectivearticles/2017/04/19/multilateralism-and-the-chinese-dream.html>.

学知识传播领域迅速赶上美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一项分析，到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科研论文产出国，而美国仍在引用率居于前1%的论文产出上领先中国。^①

另一方面，对于国际领导国来说，旨在现存的任何多边机制内推动超越安全领域的新的合作倡议，或是在气候变化、疾病控制、网络安全、电子商务领域达成新的全球协议，需要的不是庞大的核武库以及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硬实力并不能获得更多的讨价还价优势。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美元霸权反而是导致经常性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定的最重要根源，也是妨碍超主权货币更广泛使用的障碍，全球经济更需要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这样的安排可以更好地解决全球储备货币的全球功能与主权货币发行国自身的政策优先目标之间的内生冲突。^② 中国一直是主张通过提升 SDR 角色、功能的方式创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强烈倡导者^③，并在2016年成为首个发行以 SDR 计价债券的国家。

中国在最终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U. N.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的曲折且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展示了其对于结构型权力的有效运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COP21），中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其双重优势——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将自身承诺完成其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NDC）方案这一单一最大让步且可接受的保证放到谈判桌上——成为促成《巴黎协定》的关键谈判方之一。^④

根据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现如今已是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产能的世界领跑者，每年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超过美欧的总和。在2017年，中国以在2020年前在可再生能源上再投资3600亿美元的誓言基础上追加了其承诺。这意味着中国将大幅超额完成其所承诺的2030年目标。中国正通过扩大其可再生能源转移海外的方式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

① Peter Dockrill, "China Just Overtook The US in Scientific Output For The First Time," *Science Alert*,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sciencealert.com/china-just-overtook-us-in-scientific-output-first-time-published-research>. 该文引用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两年发布一次的《科学与工程指标》（*The Bienn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Report*）。

② *Report of the U. N. Commission of Experts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September 14. http://www.un-ngls.org/IMG/pdf_finalreport.pdf. 该委员会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持。

③ 最清晰的阐述来自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3月23日的一次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发言。

④ Liang Dong, "Bound to Lead? Rethinking China's Role after Paris in UNFCCC Negoti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 15, no. 1, 2017, pp. 32-38.

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其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计划，且已经在海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入了320亿美元的资金。^①中国现如今还是全球绿色债券市场的领导者，在2016—2017年度占据的全球份额超过30%。正如中国作为典型展现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将国家自主贡献要求转化为改善经济结构和塑造新商业模式发展的动力做出了示范，它也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得以在未来设立更具雄心的全球目标。

中国提供创业型领导的记录同样值得重视。在举办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时，中国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共识建设者的形象开始浮现出来。通过幕后的努力，中国帮助重新定义了G20的使命，并在过程中赋予了其长期愿景。根据亚洲观察(Asia Viewers)咨询集团联合创始人纳迪亚·杜拉洛维奇(Nadia Radulovich)和玛莉亚·塞西莉亚·佩拉尔塔(Maria Cecilia Peralta)的看法，中国有效地将集团角色从灭火者调整到了为促进全球发展稳定提供先导性措施上来。在中国的倡议下，G20杭州峰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起草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同意尽快批准《巴黎协定》、启动G20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以及全球基础设施联通联盟倡议，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借由促成这些结论，中国帮助G20实现了从危机管理机制向专注于旨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长效治理平台的转型。

中国创业型领导权的运用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案例中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为使这一多边借款机构获得公信力，中国有意放弃了赋予自身否决权的选项，尽管其认缴份额达到了31%（投票份额为26.6%）^②、为印度预留的保留份额给予了这一巨大的邻邦作为股东的荣誉、指定给亚洲以外国家的3席董事位置使之更具包容性、与世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采用全球发展融资的最佳实践以及以美元来发放贷款和发行债券。

中国还在诸多不利条件下——例如中印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分歧，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存在于印度、巴西一方与中俄另一方之间的分歧，较弱合作伙伴自身经济的萎靡不振——从零开始建立起金砖国家峰会机制，此一不可思议的创举展现了其对创业型领导权的运用。不到十年，中国就克服了五国间不断增长

① IEEFA Report: *China in 2017 Continued to Position Itself for Global Clean Energy Dominance*, January 9, 2018, <http://ieefa.org/ieefa-report-china-continues-position-global-clean-energy-dominance-2017/>.

② 相比之下，尽管美国只持有16.89%的投票份额，却依然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开发公司的主要决策保有否决权。

的权力不对称性带来的敏感问题，稳步强化了共识，建立起了从意见交换平台到旨在为实现促进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明确目标而采取有效合作行动的重要机构。^① 目前，从农业、国家安全、卫生到国际金融，已经有多达 50 多项与金砖机制相关的合作项目。^② 新发展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的建立都是不小的成就。此外，在厦门峰会上，中国推出了一项创新举措，将金砖峰会从现有成员间的封闭性年度首脑峰会升级为更具包容性的平台。在“金砖+”（BRICS Plus）机制下，其他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可以在无须正式扩员和改变身份的情况下作为主办国宾客受邀与会。在这项倡议下，“金砖+”机制致力于通过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而成为发展中世界政策协商的最关键平台。

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倾向于认为提供智识型领导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甚至是长期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他们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体系总是其负资产。尽管中国最近努力提升了其软实力，但能否让世界相信中国是一支良性和仁慈的力量并将更多的人吸引到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全球共同体的愿景上来仍然是存疑的。^③

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仅仅通过重申其对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承诺并以专项资源和具体计划予以支持，中国就能将自身定位成包容性增长与平等的拥护者。通过不断表达对于未经安理会授权攻击他国领土的单边军事行动的反反对，同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担中承担更大的份额，中国可以可信地将自身塑造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维护者。^④ 习近平主席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在 2017 年 2 月被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纳入其决议，这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是个好兆头。这一表述，虽然被西方的评论家们指责是模糊、空洞，却与有关全球共同体的社群主义想象产生共鸣，不仅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口号形成鲜明对比，也比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

①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and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anham: Lexington Press, 2015.

②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Leaders Xiamen Declaration: An Analysis," *Post Western World*, September 7, 2017, <http://www.postwesternworld.com/2017/09/07/leaders-declaration-analysis/>.

③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在 2013 年中国提供的资金仅占维和行动总费用的 3%，而今中国贡献了维和行动预算的 10.25%，同时自 2012 年起中国为维和行动提供的人员远远超过了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派员的总和。参见 Logan Pauley, "China Takes the Lead in UN Peacekeeping," *The Diplomat*, April 17,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china-takes-the-lead-in-un-peacekeeping/>.

序在规范论述上更胜一筹。^①

美国和其他西方观察家经常陷入他们自我设定的认识陷阱，认为自由、民权和民主比有效治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更受欢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敏锐地观察到，在2016年前夕，“很大程度上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后，一场有关于正处竞争中的中西方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竞赛正在进行中。这一竞争的结果将在未来数十年决定许多欧亚大陆地区的命运”^②。

在一个经济形势不确定、社会向上流动缓慢、经济不平等加剧、备受失业压力与经济不安全感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攀升的年代，中国发展模式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也将变得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正在丧失其吸引力。正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所说，西方国家又回到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所仅见的最大规模经济不平等，是由于富人掌握了操控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大量政治权力所导致的。反过来，资源在（收入）分配顶层的集中导致了富裕精英对于公众生活更加不成比例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对于公共政策偏离公众需求的不满。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越来越无力反映人民的观点，政治沦为权贵的游戏。^③ 罗伯特·福阿（Robert Foa）和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提供的所有经验证据都表明，在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代议制民主正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④ 显然，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想要捍卫自由民主的优越性，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家园内开始其自救任务。

在2017年，中国接待了48万国际留学生，很快还将超越英国和澳大利亚成为第二大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其中2/3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88%为自费留学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南亚、东南亚国家，将其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派往中国接受高级培训。当下中国每年为一万多名非洲官员提供培训。他们不仅学习中国治理体系或国家主导增长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还学习农村发展、农业援助、城市规划、公共住房、犯罪控制、

① Amitai Etzioni, *From Empire to Community: A New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04.

② Francis Fukuyama, “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Project-Syndicate*, January 12,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by-francis-fukuyama-2016-01? barrier = accesspaylog>.

③ Edward Luce,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17.

④ Robert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8, no. 1, 2017, pp. 5–16; Robert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8, no. 3, 2017, pp. 5–17.

减贫、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绿色能源等更为便捷实用的知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来到中国以中国的技术标准接受培训，因为现今中国在从核电、清洁能源、高速铁路、5G 移动电话到人工智能的广泛工业领域出口其标准，特别是通过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资。资深中国专家也在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讯联盟（ITU）、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内的开发和认证标准的国际组织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职位。^①

简而言之，中国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性能力和将其转化为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有力优势的技巧。但是，尽管已有前述凭证，中国仍然谨慎且有保留地看待“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提法，更不用说像是“中华治世”这种带有挑衅性（且容易导致国际误解）的概念。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推断，在从贸易、发展援助、地区基础设施、多边贷款、金融稳定、环境、绿色能源到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些越来越广泛的政策领域中，中国已经准备好发挥与其国家优先目标相容，也与其作为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领导角色，而且是内嵌在既有的多边架构内。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战略轮廓的简要分析来证明这一推断。

三 正在浮现的中国全球战略的轮廓

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战略首先旨在支撑其包括在 21 世纪中期使中国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恢复其在世界上恰当位置的民族伟大复兴宏愿。为此，中国的全球战略应致力维持并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和建设性的环境，以实现这一最大的长远目标。

其次，中国的全球战略依托于其富有韧性和效率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赋予整个国家机构政策连贯性和方向感，促成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就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在创造市场架构并引导改革、重组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家的全球战略应与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及韧性相辅相成。

最后，中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源自于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

^① 舒印彪：《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3 日第 10 版。

验和智慧,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对于正在浮现的21世纪的全球秩序和中国在其中的恰当角色的想象。中国预见到并欢迎一个正在浮现的多极世界,在其中任何一个全球大国都不能单方面地支配规范和规则,更不用说任意违反规范和原则而不付出代价。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样还想象着一个新兴的全球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与经济全球化和维系国际和平的共同利益、促进发展和保护全球公域紧密相连。但是这一新生的全球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面对地缘政治对抗、大众对于惊人不平等现象的激烈反抗、文明的冲突以及全球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时依然十分脆弱。

因此,新兴的全球秩序将不会(可能也不应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或是围绕中国的利益来运转。中国理性而务实的选择是准备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担保者,这是维持一个开放、富有活力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与有效因应全球共同体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新的威胁与挑战之唯一可行途径。中国愿意在现有多边机构里承担更大的责任,共同管理全球经济,为深化与世界主要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建立新的制度和机制,但是,中国也应当在它感到更加自信的领域以恰当的步伐(也即与其能力和作为正在崛起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速度)提升并扩大其对于全球治理责任(global stewardship)的承诺。

尽管仍处于持续展开与完善化的过程中,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酝酿的全球战略的轮廓更加清晰可见。基本上,它由四个关键部分组成:

第一,追求与现有霸权的“建设性交往”。中国版的建设性交往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下提出的。中国领导人深刻理解中美关系纽带(nexus)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定期的战略对话在最高层发展关系、建立信任和相互尊重,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寻求合作,管控贸易摩擦和其他经济争端,提出办法来限制和减轻战略冲突与对抗,并诱使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合理范围内尽一切努力防止最坏情况,也就是避免中美战略摊牌,否则可能将整个世界推入“第二次冷战”乃至撕裂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结构。^①

第二,捍卫、擦亮和改革多边主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日益浮现的全球角色需要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协定的基础上。然而,这一基础现在已摇摇欲坠,需要被翻新、升级和(或)改造,以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① 迈克尔·林德在其最近的论文里生动地描述了最糟糕的情况, Mich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5,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vs-russia-china-welcome-cold-war-ii-25382>。

国认为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不完美、不充分的。虽然中国赞同其大多数自由主义的特征，但并不赞同其中显在或隐含的僵化的等级制，更不用说创立者频繁的片面违规行为。中国已经着手在主要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共识，在“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心主题下提出改革议程，特别是推动朝向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结构，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发言权和责任，不仅在制定规范和原则方面，也在执行层面上更加强平等原则。中国还提议提升现有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范围，以使它们更好地应对由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失衡、巨型跨国公司的垄断权力、世界人口爆炸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寻求充分利用两个关键的政策协调平台来推进其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议程。在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启动的旨在接触更多像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重要新兴经济体的“金砖+”机制下，中国寻求利用这一平台在新兴经济体间塑造共识及阐述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利益。中国重视G20作为两个全球群体的核心领导小组之间对话、谈判、协调的关键平台之作用，一个是G7（代表发达世界的核心小组），另一个是“金砖+”（代表发展中世界的核心小组）。

中国还展现了其建立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多边机制或安排以应对现有全球或地区多边机制短缺的决心。通过这样做，中国得以对现有的多边机制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推进及时的改革与升级。例如通过建立诸如《清迈协议》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样的多边临时换汇与货币清算安排，参与国得以形成集体预防机制，以防止掠夺性的对冲基金针对脆弱成员策动汇率危机而引爆具有传染性的地区金融危机。同时这些新机制也迫使IMF重新审视其严苛的纾困条件，并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的必要性问题上接纳新的机构观点。^①

然而，中国正在推动的是全球秩序的谨慎改革而非另起炉灶。许多人相信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并没有流露出寻求推翻或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迹象。金砖国家《厦门宣言》（与之前的宣言一样）重申了其对现状的支持，没有任何弱化现有制度或安排的企图。^② 在2017年峰会的宣言中，金砖国家领导人确认“我们将坚定不移的维护联合国的中心角色、《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宗旨和原则、

① 事实上，IMF已经重新审视了其过往的紧急纾困借贷行为并在监管国际资本流动上采纳了新的机构观点。比如，Capital Flows: Review of Experienc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View, *IMF Policy Paper*, November 201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7/01/13/PP5081-Capital-Flows-Review-of-Experience-with-the-Institutional-View>。

②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Leaders Xiamen Declaration: An Analysis,” *Post Western World*, September 7, 2017, <http://www.postwesternworld.com/2017/09/07/leaders-declaration-analysis/>。

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促进民主与法治为基础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领导人还承诺:“我们重视二十国集团继续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重申落实包括杭州峰会和汉堡峰会在内的历届峰会成果。”

第三,深化南南经济合作。随着中国在产业阶梯上的升级,中国认识到深化和制度化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巨大潜力,因为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优劣势彼此高度互补,而且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摩擦的问题通常也不存在。许多南方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耕地,而中国正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石油、矿产、谷物和其他大宗物资。大多数此类国家面临着投资资本和外汇储备的长期短缺,而中国拥有丰富的储蓄盈余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多数此类国家仍然有着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具备巨大的潜力来承接转移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活动,而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被迫向产业阶梯的更高阶段升级。大多数此类国家面临着缺乏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严重瓶颈,而中国拥有空前的工程和融资能力,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世界级的一站式基础设施。大多数此类国家土生土长的企业家阶层薄弱、国家能力微弱、治理水平低下,而中国在国家能力建设、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如何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微型企业和个体运营商,创造有利的增长环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十年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地区+1”(region-plus-one)制度体系来扩大和深化经济伙伴关系,比如东盟—中国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16+1”领导人会晤(囊括11个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与5个巴尔干国家)、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大多数此类“地区+1”制度都带动了政策工作组、商业理事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专项投资基金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旨在加速欧亚大陆与其他地区融合的一项更具雄心的计划。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旨在建立一个将扩展到拉美并将通往欧洲的北极航线包括在内的全球基础设施网络。首要目标是加深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技术、文化上的联系,为维持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势头提供新的经济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范围是惊人的。它将至少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大七倍(以201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还谨慎地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加强西部边境的安全环境、抵御跨境的宗教极端分裂分子的威胁,通过邀请印度和巴基斯坦(其他有潜力的候选国包括蒙古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加入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地缘政治基础。

第四，保卫国家的经济生命线。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相连，它也更加脆弱地暴露在可能扰乱或截断贸易路线、能源供应、跨境金融交易与信息流动的各种潜在威胁面前。例如，2003年11月2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点出中国的“马六甲困局”（Malacca Dilemma），意指中国80%的能源需求来自中东，而马六甲海峡成为其途中的咽喉节点。为对冲最糟糕的情况，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备用体系或多种替代方案，并迅速升级其海军力量以遂行海外任务。中国已通过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建立了多种替代性的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以作为美国控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替代选项。中国正在建设一种基于IPV6的新版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其中美国不再垄断对根服务器的控制。中国已经升级了自身的银联（Unionpay）以使之成为与Visa、万事达卡（MasterCard）比肩的全球支付处理系统，以及创建自身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作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SWIFT）的后备选项。中国还在数字防火墙之后培育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本土的数字巨头以与亚马逊、脸书、谷歌竞争。这些替代和后备系统服务有三个目的：对冲安全风险、刺激新型商业模式和新技术的成长，使中国脚踏实地地成为另一套基本的全球商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与管理者，成为装备齐全的经济巨头。

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发展军事联盟并非中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仍然坚守长期坚持的不结盟与不干涉政策。中国领导人相信，军事联盟往往会加剧而非减轻在动荡地区（troubled region）的敌意和冲突。而且，如果中国发展联盟（可能是与俄罗斯），那美国对于中国的敌意只会强化，中美双边关系也将变得更加不稳定。^①另一项与美国全球战略形成鲜明对比之处在于，由于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在“海洋东亚”的强势存在和中日之间的持久敌意，中国仍然没有能力在地理邻近性和文化亲和力的基础上依靠广泛而有凝聚力的战略与经济伙伴来支撑其领导地位的事实。但是，中国已设法在沿着其边境的“大陆东亚”维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轴辐体系，并渴望抓住机会打造与日韩之间更为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提供了东北亚三国克服相互间政治分歧和共同努力谈成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所需动力。为了对冲美

^① Zhou Bo, “The US is Right that China Has no Allies-Because It Doesn’t Need The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3, 2016,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974414/us-right-china-has-no-allies-because-it-doesnt-need-them>.

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三国可以利用三边自贸协定作为建立一个联结欧盟、东盟、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全球自由贸易轴辐体系的关键枢纽。这是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京举行的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三边会晤中正式提议的“中日韩+”（China-Japan-Korea + X）方式所暗示的愿景。最后，在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其全球战略的要旨不仅要维持中国自身进一步的发展，还要维持而非损害全球化进程，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外部条件。但是，中国也倾向于以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上更有效的监管机制来驾驭和重新设定全球化的路径，以控制其干扰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扭转过去为人诟病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并设法扩大通过上层财富增长带动底层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

四 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吗？

中国是一个试图建立一套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对立的全面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吗？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也取决于是从“西方中心”的视角还是从全球共同体的视角看待中国崛起（以及非西方世界作为整体崛起）的多方面含义。那些对“中华治世”前景感受到威胁的西方意见领袖们经常使自己陷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两类西方中心思维中去。

首先，他们倾向于将自由主义的三个元素混为一谈：政治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相对）、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或重商主义相对）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使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相对）。^① 他们假定这三种元素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三者之间的固有紧张和矛盾。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带来了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谓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而其结果却是损害民主、侵蚀国家主权、破坏社会团结。^②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经济权力空前集中在一些巨型公司手中，它们得以运用自身的垄

① Hans Kundnani, “What is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United Nations, *Police Brief*, March 3, 2017,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what-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

②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

断性权力和非常规的政治影响获得巨额的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①此外，仅有微弱的历史证据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是基于规则的开放多边贸易体系，或是更宽泛意义上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的更为可靠的支柱。历史殷鉴不远，人们不应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保护主义升级和世界贸易彻底崩溃的正是民主政体。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郝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不顾1000多位经济学家的反对下签署生效，使世界陷入了大萧条。1929—1934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缩减了近乎2/3，世界贸易规模也萎缩了近40%。用一个当代的参照，根据WTO的统计，实施民主的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一样，2001—2016年大量实施了非关税壁垒。^②美国（加上法国、英国两个所谓自愿参加的盟友）经常在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外国发动军事进攻，构成了损害联合国权威的最坏纪录。认定采行非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必然无法成为多边主义称职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是一种自以为是且道貌岸然的假设。

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没有认识到，事实上成为多边主义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先决条件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机构，可以做出坚守多边体制安排的可信承诺，具备所有必需的行政、监督、管制、财政、强制和法律执行能力以履行其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里所承担的多重义务和责任；二是一个建立在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具有合法性支撑的富有韧性的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因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再）分配的国内冲突，并有效因应外部经济冲击的压力；三是该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有能力应付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构调整的社会经济后果，更重要的是能维持一种广泛社会共识基础来支持经济对外开放的原则，并接受成为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必要性。就满足这三个条件而言，西式的代议民主政体是否必然优于中式制度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他们倾向于将现存的等级秩序与自由主义的规范和规则混为一谈。如果预设自由国际秩序只能在美国和西欧构成其核心，并让西方国家在现有的安排下继续享有其优厚的地位和特权的情况下，才得以延续，那么，像中国这样庞大

① Richard Kozul-Wright and Stephanie Blankenburg, "The Rentiers Are Here: Rise of Global Rentier Capitalism," *Project Syndicate*, September 25,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ise-of-global-rentier-capitalism-by-stephanie-blankenburg-2-and-richard-kozul-wright-2017-09?barrier=accessreg>.

② Erik R. Peterson and Paul A. Laudicina,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2017 - 2021: The All-Too-Visible Hand*, Chicago: Global Business Policy Council, 2017, Figure 5.

且非西方的崛起超级大国进入这一核心就必然被视为是一种修正主义威胁。这一推理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不符合西方自由国家模式但渴望成为这一特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并拥有平等发言权的重要新兴力量。所以上述的逻辑推理是：一旦核心国家变得不那么“西方”了，国际秩序也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反之亦然。^①显然，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an Lagarde）对两者不应混为一谈有更好的理解。她在 2017 年 7 月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提醒她的听众，IMF 架构存在一个有序继承的机制，即“如果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而且他们的分量都及时反映在 IMF 的投票结构里，那 IMF 的总部是有可能在十年内迁往北京的”^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一次调整其配额比例与投票结构是在 2010 年。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可能性”，因为 IMF 的制度规范并不排除向上流动或是领导层的逐步重组。

这两类形式的西方中心思维非常地“独厚欧洲”（pro-Europeanist），也使得许多西欧的政治领导人不假思索地成为现状的捍卫者，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度的自负感。他们没能看到在主权国家间找到建立并保持一种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的可行方式之紧迫性，今日所有国家都深嵌于复杂的相互依存并被世界的其他部分密切包围，但却被不同的政治体系所统治，走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不同轨道上，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规模和非常多元的文化和宗教遗产。在今天的世界，如果我们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解无法超越西方中心思维的窠臼，文明冲突将是必然的结局。

而且这两种形式的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自 2008—2009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 GDP 增长的贡献度达 70% 以上。根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2017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 GDP 而言，新兴七国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在 1995 年已经相当于七国集团（G7）经济规模的一半，在 2015 年已经与 G7 的规模等量齐观，并且预计到 2040 年可能达到 G7 规模的两倍。^③因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国际秩序的领导核心将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与重组。

① 拉加德在 2017 年 7 月 24 日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中作此表述，参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mf-china-lagarde-idUSKBN1A922L>。

② 她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款的第 13 条第一款。该条款写道：“基金组织总部应设在持有最大基金份额的成员国境内。”

③ Price Cooper Waterhouse, “The World in 2050: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2017,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

如果我们超越这两类西方中心思维概念，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世界秩序剥离其特殊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带有改革主义议程的崛起中的全球大国。^① 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角色将有助于加强和重塑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许多重要原则，就这层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改革者（而非修正主义者）。首先，中国赞同一个以规范为基础而非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坚持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其中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P5）在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否决权，并将侵略和以战争手段追逐国家利益定义为非法。中国签署了防扩散问题上所有主要的国际机制，并在它们的执行上发挥了作用，包括积极参与促成伊核协议，以及在缓解朝鲜半岛酝酿中的核危机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也公开承认的。

中国在包容、非歧视、互惠和透明的原则下拥抱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偏好开放的地区主义，拥护以多边途径实现贸易自由化。中国坚持在 WTO 框架下或通过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特别援助以及优惠待遇的准则。现如今，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维护者、是有助于包容性增长和强化社会可持续性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以及全球化的捍卫者。中国通过多边协议和全球协作机制努力在保护全球公域上做出恰如其分的贡献。无论是在诸如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现存多边机制，或是通过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应对新型全球挑战，中国也都展现出了承担更大责任的强烈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许多西方国家应当庆贺自己已经由社会化（socialization）而成功地将中国融入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的自由世界秩序。

然而，社会化进程日益成为一条双向通道。正如中国官员已经被社会化或开始将认同、政策取向、规范、程序等全球制度的特征内化，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改革议程。他们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些多边机构超越其既定的内生规范和实践，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其治理结构的变革。^② 例如，中国已经成功地推动 IMF 加强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而非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的失衡导致了金融和外汇的不稳定，启动对 IMF 配额制度（投票份额）的定期审查，以及将中国的人民币纳入 IMF 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让大多数西方领导人真正

① 从不同角度出发，在兰德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中，迈克尔·马扎尔也认为，宽泛地讲，中国不应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反对方或是破坏者，而应被视为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参见 Michael Mazarr, *Summary of Building a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jec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p. 14。

② Gregory Chin, “Two-way Socialization: China, the World Bank, and Hegemonic Weakening,”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9, issue 1, 2012。

焦虑的是，中国对其自身的发展制度越来越自信，并且表现出一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经验的强烈意愿。事实上，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模式正在挑战许多西方价值和固有制度的普世性，这些价值和制度被西方奉为是建立合法政治秩序和追求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中国模式在实现回应型政府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上挑战了西方自由民主或自由市场体系的优越性。中国的政治体系优先考虑社会赋权和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权利，并在个人自由之前优先考虑有效治理和社会稳定。

中国也赞成一种替代路径来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和地区一体化。不像美国主导的援助机构仅仅愿意背书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中国倾向让政府、多边政策协调机制、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同于欧盟模式或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国推动的区域主义和经济伙伴关系并不将安全同盟和民主国家的团结作为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一方式并非中国首创，因为东盟（以及其他非西方地区）已经践行了数十年。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劝说发展中世界不加批判或是全面地采用其发展模式，因为这一做法与其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座右铭和累积的经验背道而驰。根据自身的经验，中国反对在华盛顿共识下一刀切的做法，并且不相信历史终结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最终趋同的主张。很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时，中方人员反复提醒他们，中国发展中国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存在可以为解决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挑战提供正确且完整的答案的标准教科书。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试图使相关的知识和实践适应于他们国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定情况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他们也经常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难以轻易地移植到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毕竟中国在反帝斗争和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走了一条相当独特的轨迹，更不用说中国还有着巨大的规模、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相挂钩，尽管中国软贷款和援助的分配很可能也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考虑，并涉及其他对外政策优先事项的考量。

许多西方政治领导人还担心中国已经准备好并渴望填补美国盛世和平退缩后留下的所有真空。这是一种典型的伪问题，因为它与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国家在其中合适角色的思维并不合拍。首先，中国没有意愿或是倾向去缔造另一个霸权，或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优势，或在可以想见的最远范围内扩大其安全需求并抵御任何可见的潜在挑战。因而，在一个后霸权世界，许多所谓的战略真空可能根本不是“真空”。随着美国

霸权势力的消退，这个世界仅仅是在回归“常态”，也即是在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力消退后浮现的自然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和区域性动态均衡所可能导致的局面，并不一定会比美国自告奋勇担任世界警察或主导区域军事平衡情况下更糟糕。

毕竟，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民主帝国主义”计划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① 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处方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产泡沫、金融危机、有害金融衍生商品泛滥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同时大多数国家都被迫缩减或废弃为其最脆弱群体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和工具。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政策明显地加剧了（如果不是直接导致）伊朗和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在许多地区，中国并不被期望（更不用说欢迎）成为一个“不请自来的国际警察或是政治导师”。在长期坚持的不结盟和不干涉内政政策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意愿去这么做。

在另一方面，中国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期待甚至是欢迎在现有多边框架下承担更大的责任。鉴于其体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通过 G20 和其他多边机构以及政策协调平台共同管理全球经济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已经大大增加了其对联合国、安理会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大家庭里一连串专门机构的财政和实物援助，而美国却正在削减其对联合国预算的年度贡献并已经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人权理事会。

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期待并欢迎在现有多边安排下的国际公共产品处于短缺时提供补充性产品。亚投行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无论是私营部门的资金，还是东道国公共部门的预算，或是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都无法满足这些地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在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里，亚开行警告称，2017—2030 年，亚洲需要投资 26 万亿美元来解决世界上增长最快经济体发展的严重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然而，该报告除了重复政府需要动员更多资源和使基础设施投资对私营部门更具吸引力的口号外，并未提供克服这一瓶颈的具体解决方案或建议。^②

在其他情况下，中国被期待并欢迎来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当他们压抑的需求被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或西方捐助者所忽视时。例如，相比传统的以

① Omar G. Encarnación, “The Follies of Democratic Imperi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2, no. 1, 2005, pp. 47–60.

② ADB,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February 2017,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infrastructure-needs>.

国家为范围的投资, 尽管潜在的回回报率很高,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区域性公共产品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融资不足问题。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投资每年仅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3.5%。区域投资的回报率可能很高, 特别是在非洲, 对跨国基础设施和制度融合的投资能够减少由于区域内诸多小型经济体和诸多边界造成的高成本。^①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指引下, 过去十年里中国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填补了这一空白。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于2015年启动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倡议。这一泛非项目将提供价值150亿美元的高速光纤网络, 连接48个国家82个主要城市, 并将在2023年建成后使数亿非洲人能轻松地接入高速网络连接。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已经促使若干非洲国家制订并实施自身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业 (ICT-related sectors) 和电子商务的国家发展计划。

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 西方政治领袖真正需要担心的有两部分: 第一, 如何在西方国家国内重塑支持经济开放和多边主义的社会基础; 第二, 在缺乏关注的广泛全球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真正的真空”。比如, 为了全球共同体的社会可持续性, 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征税的全球监管机制来打击避税天堂和逃税的猖獗行为, 并迫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履行他们的最低社会责任, 即确保跨国公司在他们产生盈利和(或)开展增值活动的国家缴纳其应税的合理份额。否则, 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财政危机将无法挽救, 并且收入与财富的畸形分配最终将招致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② “真正的真空”清单是一份很长的清单, 从保护全球公域、维护移民的基本人权、节制高科技巨兽对市场垄断性权力的滥用、禁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致命性自动武器(如杀人机器人), 到帮助确定电子合同、数字支付系统以及消费者保护基本标准的全球电子商务规则创设等。

五 结论: 前方之路

以美国优势地位为明显特征的战后世界秩序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加真实的多边秩序, 在这一秩序里, 没有全球大国可以单方面制定规范和规则, 且所有关键方都需要理解其他大国的不同观点和关切。如果西方政治精英对于保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世界秩序的遗产是真诚的, 他们就必须认识到在既有多边安排下重新

^① Nancy Birdsall, “Underfunded Regionalism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49, 2011.

^②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公报里, 二十国集团已经承诺致力于为一个“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而工作, 特别是通过打击避税, 确保跨国公司在他们实现盈利的国家缴纳合理的税收份额。

平衡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利益和责任的迫切性，并且学会与一个没有达到他们的全部期望、显然也并不符合他们价值喜好的中国共存与合作。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经常被美国的政策精英理解为其他大国应该拥护由美国创建与设计的国际秩序，而且继续支持美国在这个秩序中享有制定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之规范的特权。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认为他们将接受这一观点，是一种狂妄的假设。对他们而言，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该是意味着，如何使现存的国际制度与快速变化的世界更加一致，特别是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更加一致。尽管新兴经济体应当以有节制的速度来推进以避免用破坏性的方式扰乱现存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制。对西方政治领导人而言，最明智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与中国（以及其他关键新兴经济体）就捍卫和改革现存多边制度，以及开展多边合作应对威胁到全球共同体社会可持续性的诸多新挑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西方政治领导人不应被一些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错误知觉所迷惑。是的，中国正在寻求更加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也准备好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它的全球领导角色仍将是有限的和嵌入式的（embedded）。以大多数标准衡量，这并不等于追求一个“中华治世”或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国际领导权将（也刻意）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只准备好在其资源、能力和管理责任明显合宜的领域内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的领导权将（也被预期）是嵌入式的，因为其领导角色将受到无数结构、制度和政治上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他自身发展的优先目标考量，兴起中的多级世界格局，现有和新兴的多边安排，由各种行动者（超国家机构、民族国家、次国家地区、跨国公司、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相互联结形成的高度多样性的全球社会空间，以及高度相互依赖和数字化的全球经济，这个紧密的全球经济体是通过互联网、无缝衔接的全球供应链、高密度的商业和金融网络、跨国精英网络、复杂交叉持股（interlocking-ownership）与合资企业和即时金融交易连接编织在一起的。欢迎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其复杂和多样性绝非美国盛世的和平或是“中华治世”架构所能覆盖。